

新导演群体:游走于商业与艺术之间

据新华社 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后,中国电影产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大导演加上姜文、陆川等亿元导演俱乐部格局被打破,一些新人导演开始引领票房。从宁浩、乌尔善、赵薇、薛晓路、徐峥到吴京,这个新的导演群体,却始终处于无法命名的局面。

正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的第2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有专家指出,这一新导演群体的共同特点是遵循“工业美学”原则:秉承电影产业观念、类型生产原则,游走于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

寻找自身和市场需求的平衡

这一批新导演出身各异:“演而优则导”的赵薇、徐峥、陈思诚、邓超,“写而优则导”的韩寒、郭敬明,学院派出身的薛晓路、曹保平,拍广告、视频出身的乌尔善、李蔚然、卢正雨,“海归”背景的金依萌、李芳芳,自学成才的非行、吴京等。

导演陆川曾指出,“第六代”导演是完整的一代,是电影节培养起来的,而这些新导演是中国电影市场培养起来的,一直在寻找自身和市场需求的平衡。

按照商业性、艺术性的关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这样划分这个群体:有的导演更加偏重商业性,如宁浩、徐峥、滕华涛;有的导演能相对平衡好这对矛盾,如乌尔善、刁亦男、曹保平;还有一小部分人坚持走文艺片路线,如杨超、毕赣、张猛、韩杰等。

他指出,这一新导演群体的生存环境是一样的:中国电影产业化大发展、互联网势不可挡、技术极大提升等。“这些导演没有‘第五代’导演以启蒙者的姿态讲述精英话语的欲望,也不用体验‘第六代’导演在工业与艺术之间无处安身的迷惘,他们在票房和口碑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得益于他们游走于电影工业化生产体制内,并能处理好与个人风格表达之间的关系。”

比父兄辈更尊重观众和市场

2003年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的商业和工业属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导演群体,不可避免地与当下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盛行,工业化、信息化大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部分新导演刚起步时没有丰富的执导经验,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对他们来说,第一要务是生存下去。因此,商业电影是他们大多数人的首选,过分个性化的、私语式的艺术表达在大多新导演作品中不会过分彰显。”陈旭光说,他们遵循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那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的商业性、艺术

性的矛盾纠葛中扮演好“体制内的作者”。

他举例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被认为是商业和艺术相得益彰的典范:选择观众容易产生兴趣的悬疑题材,融合了警匪、情色、黑色等元素,叙事的丰富和复杂,人物的矛盾与纠结,节奏的紧张与张力,都表达得恰如其分。

其他如《画皮2》导演乌尔善、《一夜惊喜》导演金依萌、《北京遇上西雅图》导演薛晓路等,陈旭光指出,都是在保留自己美学风格的同时,诚心服从于“制片人中心制”等工业化生产方式。

陈旭光说,与父兄辈的导演相比,这些后“第六代”导演更尊重观众和市场,更认同产业运行机制,更甘心做好电影生产流水线上的有机一环,努力将电影艺术性表达与商业诉求相结合,将中国电影推向新高度。

类型片创作扛起抗衡好莱坞重任

专家指出,大部分新导演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着好莱坞商业大片、类型电影的耳濡目染,类型电影生产成为他们的重要电影生产规范。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发明的一种电影创作方法,一种艺术产品标准化的规范,主要类型有喜剧片、爱情片、西部片、犯罪片、恐怖片、歌舞片等。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副研究员刘藩把中国新导演群体在类型片上的创作分为4类。第一类是具有海外专业经历的类型片导演,如《捉妖记》导演许诚毅、《非常完美》导演金依萌等,他们自觉地把海外类型片经验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

第二类是乌尔善、吴京、宁浩、徐峥、薛晓路、丁晟、非行、陈思诚等成熟的本土化类型片导演,他们熟悉市场和观众,已积淀了票房号召力,是代表产业未来趋势的中坚力量。

第三类是类型意识明确的青年导演,其资历略逊一筹,但作品已经获得市场认可,如《绣春刀》导演路阳、《滚蛋吧!肿瘤君》导演韩延、《火锅英雄》导演杨庆、《煎饼侠》导演董成鹏等。

第四类是追求个性化表达的类型片导演,如《烈日灼心》导演曹保平、《罗曼蒂克消亡史》导演程耳、《师父》导演徐浩峰等,他们的个人表达冲动开拓了类型片的边界,促进了本土类型的多样性发展。

“这4类类型片导演,正在以导演新势力的姿态逐步扛起抗衡好莱坞的重任。”刘藩说,“只有这些导演的群体发展壮大,才能提升中国电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夯实产业基础。” ■白瀛 王靖



9月26日,由故宫博物院与河北承德市文物局共同主办的“天禄永昌——故宫博物院藏瑞鹿文物特展”在北京举行。故宫博物院与承德市文物局合作,从承德避暑山庄挑选9只梅花鹿在慈宁宫花园进行展示,同时在永寿宫展出书画、玉器、瓷器、珐琅、牙木竹雕、家具等69件精美文物。图为游客在故宫永寿宫参观展出的鹿角椅。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启动

据新华社 作为国内唱片(音像)界权威大奖,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9月26日在京启动。本届金唱片奖将“全面瘦身”,于今年年底在昆明举行颁奖典礼。

第十届中国金唱片奖由中宣部批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唱片总公司及昆明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支持。

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第十届

中国金唱片奖参评范围是自2013年以来在中国出版发行的文艺类音像制品(含以电讯、网络载体发表传播的作品),数字新媒体与传统出版载体以同等地位参加评选。为了适应当今唱片出版业状况,本届中国金唱片奖对奖项设置进行调整,浓缩了奖项数量,进一步提升金唱片奖的含金量和艺术水准。设置的20个奖项涵盖了民族类、美声类、戏曲曲艺类、少儿类、器乐类、流行类、音乐录影类、综合类等范围,兼顾市场性、专业性和艺术性。

在以往的九届评选中,中国金唱片奖已先后表彰了李德伦、梅兰芳、侯宝林、彭修文等许多艺术大师,推出了郭兰英、吴雁泽、李谷一、殷秀梅、阎维文、刘欢、董安格、周杰伦等一大批优秀歌唱艺术家、歌手,以及刘明源、王国潼、刘德海、刘诗昆、闵惠芬、鲍蕙荞等众多优秀器乐演奏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培养和推广优秀艺术人才的重要舞台。

据悉,本届金唱片获奖作品均将集结出版,并制作限量版黑胶唱片。 ■史竞男

江西“锁痴”:卅年收藏古锁万余把 倾力“锁住”民间智慧

据新华社 自幼喜爱古锁,20多岁起醉心于古锁收藏,30余年来,来自江西抚州的“锁痴”熊文义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搜集到古锁万余把,倾尽全力保留濒临消失的民间智慧。

走进熊文义的储藏间,满满当当一屋子的藏品从桌面、箱子里一直铺展到地板上,让人几乎无处下脚。木的,铜的,铁的……各种材质和色泽的古锁仿佛都凝结着久远的时光,令人眼花缭乱。

“我这里最少有1万把锁,100多个种类,最早的是汉代的。”熊文义一面自豪地介绍,一面小心翼翼地拿出几件心爱的珍藏向我们展示,声音有些沙哑,“这是倒拉锁,钥匙很细小,带着个钩子,从上面插入锁孔提拉开锁;这是双开锁,单凭一把钥匙打不开,还需要触动底部的一个机关;这把很大的,是清代山东地区的城门木锁,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

一把把古锁,外表朴实无华,内里却暗藏玄机,着实令人称奇。

熊文义最引以为傲的是一把数年前从西藏林芝地区收来的八盖木锁。他记得,当时正值冬天,他委托当地人寻锁,每天付给对方几百元的补贴,还要包管吃住,跑了很多天终于得到这把极为精巧珍贵的明代古锁。

“这把木锁的内部构造非常曲折迂回,犹如一个小小的迷宫,所以又叫做‘迷宫锁’。”熊文义将一把“九曲十八弯”的钥匙插入锁中,轻轻一拉,

锁便开了。

“你别看现在开锁很容易,但要仿制一把匹配的钥匙可比登天还难,必须适应锁内的每一个拐弯的角度和长度,多一分少一毫都不行。”熊文义娓娓道来。

对锁的痴迷要追溯到熊文义少年时代。那时候,他就常常攒下钱从别的小朋友手里买邮票、糖果纸、小铜锁等小玩意儿。上世纪80年代,熊文义上大学期间,开始古锁收藏,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将一生的热忱都献给了这件事。

“我就是觉得锁是个好东西。”他说,“使用木锁的老百姓,都是古代社会最基层的人民群众,这些木锁凝结着劳动人民的智慧,你不看看,很难想象他们怎么会这么聪明!”

熊文义回忆说,2015年,在一个古锁展示会上,中外参会者见到他带去的木锁藏品无不叹为观止;尤其是在西方人眼中,木锁与其熟悉的金属锁大相径庭,他们不敢相信东方的木锁竟有如此高超的理念与技艺。

事实上,古锁的价值远不止其本身。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均告诉我们,中国的制锁业历史悠久,收藏保护古锁不仅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观察几千年来制锁工艺的流变、传承其中的工匠精神,对其进行的研究,更可以切入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探寻诸如国家仓储、警卫制度、民间治安状况、审美取向等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问

题都极具价值。

熊文义的收藏规模越大越忧心,他说:“古锁,尤其是木锁特别容易朽坏,晚一步去搜集保护,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智慧可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2012年,熊文义产生了开一个个人博物馆的想法。谁知当年春天,他被诊断出患有喉癌。病情最严重的时候,3个月无法进食,体重由150斤锐减到110斤。

“按说面对死亡应该什么都放下了,可是我却放心不下这些锁。”熊文义追忆往昔,仍然感激这些锁给了他精神的支撑和寄托,“我那时候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还没有让人看见这些好东西呢。”

病愈后,熊文义开始更加不计成本地收购古锁,几乎将所有的个人收入都花在了这上头。他甚至还为了传递图片方便,给长期合作的20多位寻锁老人一一补贴,将他们的老人机换成了智能手机。

现在的熊文义,视锁如孩子如家人。每当拿到新锁,他就如痴如醉地研究;遇到“残锁”,他要进行修补,甚至还会自己给无匙锁配钥匙。因为担心电路失火,储藏室里不敢开空调,闷热得让人汗流浹背,但他却常常埋头伏案,一待就是一天。

“我想在全国范围内开1至3家古锁博物馆,让大家了解先祖们的智慧。”熊文义说。 ■朱昊晨 刘茜

云南借力“专家+志愿者” 为古籍“上户口”

据新华社 2017“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云南行”活动近日收官。两个月来,古籍保护专家与志愿者深入一线开展古籍普查工作,给散落云南各地的数万册古籍文献建立完整“身份信息”。

云南古籍丰富,各类古籍存量逾百万册。许多古籍分藏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寺庙,有些长期“沉睡”在民间,需分类整理、登记编目。近年来,云南创新引入“专家+志愿者”模式开展古籍保护,缓解了人力不足问题。

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计思诚介绍说,此次志愿服务行动受援单位包括大理州图书馆、剑川县图书馆、巍山县图书馆等单位。志愿者已顺利完成受援图书馆全部馆藏

古籍的整理、分编及登记工作,共普查登记古籍3477部、27606册。

据了解,普查登记完成的古籍内容涵盖宗教文化、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多领域。志愿者详细记录了每部古籍的分类、年代、著者、版本、装帧形式、册数、收藏单位等信息。

与此同时,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派出古籍修复专家杨利群等人跟踪调研古籍破损情况,制定修复计划。

杨利群说:“我们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为今后修复和保护等工作打下基础。” 2008年起,云南省古籍普查人员开始深入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展开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到目前,云南省超过70%的古籍文献已完成登记编目。 ■许万虎 赵珮然